

■ 岁月如歌

# 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的人

■王珍

“高小毕业的人请举手。”在新征入伍的几百名战士中，只有寥寥数人高高地举起了手。在众人羡慕的目光里，那些举手的人都被叫出了队列，立即就被抽调去当文书、通信员、卫生员、电报员等，剩下的都去了步兵连。

这一幕给新兵小王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，成为他脑子里的永久记忆。本来，还以为当兵的人，只要练好枪法能够勇敢地冲锋陷阵就行了，没想到文化知识在军队里是那么重要。当时，部队里用的大多是苏式装备，那些懂俄文、能看说明书的人，自然是部队里的宝。

小王一直珍藏在心的“上学堂”情结瞬间满血复活。若不是在穷人也可以上学的时光，他已经超龄失去了机会。没文化一直是他的胸口之痛。每次看到上过学能识字、有文化的人，小王的眼睛一定

会熠熠生辉，他的心里充满了对文化的向往和崇拜。

早在小王还在小山村里当民兵队长时，只要有机会上区、县、市里开会、培训、学习，他的眼睛一直会在人群中扫描，寻找有文化的人。一次在人民武装部学习时，他一眼就看到了他，一个眉清目秀长得有点像演员陆毅的小帅哥。这小帅哥衣着干净、挺刮，在一群土味的农民小哥中显得很洋气，很惹人注目。

小王认定他是文化人的鉴别方法很简单，就是20世纪50年代侯宝林说的相声——那时的文艺范儿是中山装左上口袋插支钢笔，帽檐舌别在外面，彰显的是识字的文化人。细分起来：插一支笔的，是中学生；插两支的，是大学生；插三支或者以上的，那是修钢笔的！我一直喜欢这个段子，也是照此方法来甄别真伪文化人的。对那些学历、学

位、证书特多，职称、头衔特多的人心存疑虑：那满身的披挂，有没有可能是小贩的噱头？

“我们做朋友吧？”小王对那位只别一支钢笔的帅哥说，没有自卑、没有顾虑，只有一心一意靠近文化的勇气。就这样，没上过学的山村村民小王认识了大县城里的文化人陆才林。

陆同学是位真诚大方的好青年，不矫情、不清高，欣然接受了这个羡慕他的新朋友。所以常常有人说，交朋友趁年轻，可以无限接近纯真的儿童世界，谁都可能成为谁的朋友，没有任何限制和功利，只要能一起开心地玩耍就行。当然，能从穿开裆裤一直玩到老的发小，除了缘分，一定还有一种共同的东西，让他们在岁月中不离不弃，从相遇

到白头。

小王在新兵连又一次惊

喜地看见了陆才林，他们被分在一个连、一个排，小王在11班，小陆在12班。小陆是小王的好朋友，也是小王的第一任文化辅导员。

小陆是个文体积极分子，很活跃的一个。可惜，在一次部队运动会撑杆跳时，在2.4米处失手跌了下来，结果小手指挥断了，就调去通讯连当了报务员。一年余，小陆便复员回家了。

小王参军后就像我们考进了大学。部队向文化大进军，教员告诉大家，没有文化的军队是落后的军队，落后就会挨打。部队向目不识丁的战士们施行速成识字法，要求每一个人快速学会2000个单字。

小王仿佛天生就是读书的料，学文化的速度很快。不到半年时间就拿到了初中毕业证书。后来，又用了一年时间学数理化，达到初中毕业的

水平。他也像小陆一样，成了文化教员，还被调去营部当书记员、团部参谋股长……

这一批20世纪50年代初的志愿军，3年后基本都复员了，600多人只留下了4个人，小王就是其中之一，在部队里，从小王一直到老王。

后来，有好几次清明节，老王带着女儿小王，在战友陆才林的墓前祭拜，一次次讲述当年小王和小陆的友情，从文化崇拜开始，到战友情谊长存，从来没有淡出过生命。老王一直有种深深的遗憾：“我没能帮助他一起进步……”这话我亲耳听到过好几次，因为我就是老王的女儿小王。

女儿小王虽然运气好，读了一点书，但从来不敢不知天高地厚，随便叫老王一介武夫。因为老王怀揣一纸军队这所大学的毕业证书，这唯一无形的文凭，就是中山装左上口袋插着的一支钢笔啊！



丰收的梨园 郭建生 摄

■ 凡人凡事

## 被“意外之财”撞腰

■桑麻

妻子老家在浙北小县城。她上有两兄两姐，下有两个弟弟。她因嫁给我离开家乡已四十多年，其余兄姐弟弟都还在老家。

几年前大舅哥因病去世。几年后，大嫂想卖了家乡老宅，去大城市投靠儿子。谁知卖房之时遇到了意外：当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告知，要按《继承法》规定的继承程序先分割遗产，再由全体所有权人同意签字，方能出售此房。

大舅哥因家庭结构简单，又无巨额遗产须分配，所以生前没留遗嘱，因此适用法定继承程序。法定继承第一序列是配偶、子女、父母，三者有同等继承权。

据民间几百年传统习惯，夫妻中如一方先去世，遗产就由另一方自动继承，子女不可能与父（母）争继承权，公婆（岳父母）就更不可能与儿媳（女婿）争继承权了，司法机关也默认此二者自动放弃继承权。

但此时恰逢新修改的《继承法》正式开始实施，对现金和其他财产继承，司法机关还是采取“民不诉、官不理”的原则，任当事人自行处分。但对不动产（主要是房产）产权转移就开始严格按照继承顺序进行，于是就给我们带来了这笔“意外之财”。

大舅哥与大嫂育有一子。大舅哥去世时，此房作为夫妻共同财产，二分之一为配偶所有，剩下二分之一属于被继承遗产。第一顺序继承人有大嫂、侄儿和当时还健在的我岳母，她可继承这份遗产的三分之一份额。

大嫂欲售房时，岳母已去世，她名下的这三分之一份额，就成为六名子女可继承的“新遗产”，妻子就这样被一笔意外之财“撞了腰”。

六兄妹自然都声明放弃这份遗产继承权，但口说无凭，必须亲自拿上各自身份证件，跑到当地公证部门，面对公证员表达自己“自愿放弃继承”的意愿，再办一个“放弃遗产继承”公证书，事情才能解决。其他兄弟姐妹都在当地，抽个空约个时间跑趟公证处，就把事办了。我家住在省城，妻子还得为此事专程回一趟老家。

大嫂电话里虽说不着急，但听得出来，其实心里很焦急。也是，只要我们不好“放弃继承”公证书，她家的房子就没法卖。

我们只能放下手头杂事，安顿好上幼儿园小孙子的接送，网上购好火车票，又陪她辗转坐地铁、火车、汽车，匆匆赶回老家去，在某公证处所与早等候在那里的侄儿和大嫂会合。这是我们首次与公证所打交道，公证员核对当事人身份证，以验明正身；然后在全程录音录像下，签署“放弃遗产继承”公证书，签名画押按指印加宣读，表明放弃遗产继承是自愿的真实意思表示，这才算完成了一笔意外之财的放弃任务。

新通过的《民法典》明年1月1日开始实施。它全面调整和保护公民自出生至死亡的所有与人格权、财产权有关的内容，正式实施后，说不定会给更多人带来意想不到的“惊喜”！

■ 真情时分

## 难以忘怀的线路图

■翁建飞

她特意画一张去她家玩的线路图寄给我，约我去她家玩的这事儿，一想起来就让我的心海荡起阵阵涟漪。现今社会，一个女孩允诺一个男孩去她家玩、去见她的父母，那八成是瓜熟蒂落、结亲成家的前奏。但在当年，我和她似乎都没往深里去想，反倒觉得约伴相见自然而然。

她的父亲在我入伍前就调离了我所在部队，到一家兵工厂任职。她被安排寄宿在父亲老部队的家属楼，每天乘坐部队接送家属的班车，往返于驻地县城的一所中学读高中复习班。

我撂肠刮肚也回忆不起同她认识的初始，只是想象一种可能：那时她读高中复

班，我备考军校，同是高考冲刺人，因相互交流考学而结交。她中等个儿，一头短发，纤小文静，笑起来脸颊上会现出一对小酒窝。受制于部队严格的纪律，我与她熟识后碰面，往往只是相视一笑打个招呼。

她离开我所在部队时没有机会同我道别，隔了好长一段时日，我接到她的一封信，方才得知她被一所师范大学录取；而我热切向往的那所军队政治学院，由于名额限制未能如愿报考。学校放暑假，她回到了老家父母身边，我收到了她邀请我去她家玩的一封信。这信里面附有她画的一张去她家的线路图，从哪儿上车，到哪儿下车，再到哪

个码头轮渡等等，标注得清清楚楚，邀约显得十分质朴而真诚。

自打记事起，伙伴之间相约玩耍不计其数。我同她相识时间并不长，相互之间的了解也非常有限，没想到她那么用心，特意画一张线路图寄给我，约我去她家玩。

她念大三那年，我退伍回到了老家农村，与她相隔万水千山。原以为此一别两无相挂，可她嫌弃我这个“农村兵”，依旧同我保持书信往来，还为我奔前程打气鼓劲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她没被世俗羁绊，真心实意地约我去她家玩，内心装着她对父亲手下一名士兵的敬重、信任与温情。

■ 情景交融

## 老屋与水稻田

■方红升

水稻田在老屋旁，夏夜的傍晚，时不时便会传出“咕咕”的蛙声。这蛙声，有的似从山坡内里深处传出的，脚下有震荡的感觉；有的像是禾叶下的水面上传过来的，声音要脆响得多。这脆响的蛙声，往四下里传播出去，便招来了山风。于是，老屋的周围，便开始凉爽起来。

在开化县长虹乡真子坑的高田坑，这样的凉爽之地有好几处。而我叙述的这份凉爽，是在石崖头上。

老屋，独门独户。与庄里的那份热闹有联系，却不凑近。它不属于城里人所说的那种闹中取静的场景，而是充满着小山村所特有的那种朴实和空灵的静。这种朴实和空灵的静，是会沁入灵魂深处的。一旦被人记住，便永远不会忘记。

上石崖头，要步65级台阶，这是老屋与村庄联系的唯一脉络。人走在上面，有上下跳动的感觉。

两棵高大的红豆杉树，如同两名“带刀护卫”，死死地守着它们身边的这65级台阶。传说这两棵红豆杉，曾经被吴越王封赏为“衣锦将军”。据说在五代时期，村里有一位牧牛娃当了吴越王之后，回乡与乡亲们喝酒高兴了，便脱下身上的衣服挂到树上，之后便留下了这样的佳话。于是，红豆杉树下，常年留有认亲和祭祀的痕迹。

田里的稻秧，正在发棵。水里的蛤蟆蛋蛋，已经孵化成

了蝌蚪。它们是蛙或者是蟾蜍的幼体。每个蝌蚪的身后，都拖着一根长长侧扁的尾巴。它们能在水中行走，全靠这侧扁长尾给的动力。

水稻田旁的老屋，门敞开着。不是山里人家没有安全意识，而是这里的民风纯朴，都是乡里乡亲的居住在一起，无需在心里扎起那道“篱笆”。

老屋的女主，是彬的母亲。她是个能干、贤惠的女人，家里家外一天到晚忙碌个不停。特别是她的那一手家常菜，让人吃得有滋有味。

彬的母亲，是位60多岁的老人。只要吃过她烧的菜，便会记住她的人。去老屋吃饭的那天，她还在帮邻居做小工。听说我们到家了，她便从工地上赶回来。她的勤奋和热情，感染着我们一行每个人，不知不觉让人从心底生出一份敬意。

我怂恿彬的母亲开农家乐。因为她做的菜确实太好吃吃了。特别是她烧的清水鱼，色、香、味一个不落，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肚子已经吃饱了。

水稻田的出水口被一块泥巴封堵了一半，这是山里人在水稻田里特有的一种农事行为。这块泥巴，看似随手的一个动作，作用却是用来控制水稻田里的水位。只有最佳的水位，才能哺育着禾苗茁壮成长。

水稻田依老屋而出彩，老屋赖着水稻田生活。

■ 直击真相

## 休渔背后知多少

■林上军

休渔时节，渔民在干啥？他们状态如何？笔者日前来到浙江某重点渔业县，和渔民老大、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人进行了交流。

该县共有渔船近2000艘，约占全省的15%。

渔嫂在村口补网，渔船整齐划一停泊港湾。笔者首先来到一家渔业合作社办公大楼，看到有渔民陆续进楼参加技能培训。

“普通船员参加救生、消防等基本技能培训，职务船员是参加升级考试培训。”一姓胡的船老大说，他所在的船叫蟹笼船，主要捕蟹，船员十来

个，七八个是外地人，分别来自四川、河南、安徽等地，年龄以30岁至50岁之间为主。职务船员基本就是本地人，且有的还有小额股份。作为船主，他于2014年新造的这艘船，当时投资600多万元，现在债基本还清了。

今年以来，受疫情影响，渔民收入缩水，3月中旬出海至5月1日回港，船员收入约在2万元至4万元之间，比去年同期减少五六千元。往年船员的全年总收入约10万元至15万元之间。今年因为劳动力紧张，预计船员薪酬支付不会少于这个数。

船内有暂养活蟹的水舱，靠运输船及时装运至水产交易市场，运输船至舟山沈家门水产市场的运输时间约七八个小时。每艘渔船与两三艘运输船挂钩，以确保渔获物及时运至交易市场。当然，有时他们也会把蟹运到江苏一带的水产市场。

外地船员一般都回家了，作为船主的胡老大有空就要到船里去看看。胡老大还是党员，平时经常参加党组织活动，是渔业合作社培养对象。

今年41岁的胡老大，20岁从事捕鱼营生，从烧饭开始，29岁当船老大，可谓资深渔老大。讲起这些年的变化，他说首先是柴油补贴少了。10多年前，柴油补贴刚实行时，一艘船可以拿40万元，后逐年减少，现在只剩8万元。他知道这是国家为了控制渔船马力，压减捕捞强度，保护

海洋生态环境。但他反映，有的省份还在鼓励增加渔船，当地也有渔民到外省去申请渔船马力指标；船打好后，船籍挂在外省，船有时停靠在当地渔港码头。

胡老大说，伏休这么多年，浙江渔民最遵纪守法。但有的省份渔民，采取一证多船方法，在休渔期进行偷捕。尤其是休渔期快结束时，“抢跑”现象时有发生。

“现在30岁以下的本地人撑船很少了，年纪轻的船员越来越少。”胡老大说，去年他的船产值400万元，纯利50万元。

“在确保安全前提下，渔老大赚点工资钱还是有的。”胡老大说，在海上要防止被大船撞，有风的天气要随时抛锚，风大的天气及时回港。“休渔效果比较明显，这几年渔场资源总体量还是稳定的，但因为渔船仍比较多，渔场资源大家都在捕，感觉单船捕捞量有一点点减少。”据他了解，受疫情影响等因素影响，上半年部分渔船亏本。

问起下一步有啥期盼，他说最好保险费减免一点。近几年保险额度提高，保险费增加，像今年这样情况，保险公司能否降低一些费用，减轻渔民负担。

在与胡老大交谈后，笔者来到该县海洋与渔业局，采访了一位分管副局长。他说，伏休期已捕捞忙时，计划培训渔民7000人，约占全部渔民的三分之一。渔业从业人员完成了理论课程后，还要通过在线测试。伏休期，还要与市场监督部门联合查违禁渔获物，日前便查到一辆外地来的冷藏车，内有53箱冻子蟹，每箱3.5公斤，马上没收。另外，还要组织人员到滩涂查违禁网具，在港湾内查偷排机油现象。

“今年船厂安排紧张，有的渔船懒得等候，就自己清洗油箱，又不肯请油污处理公司，导致偷排油污，上半年已查获十多起。”这位分管副局长说，为确保修船质量，船检科人员分四组下沉船厂，马不停蹄，蹲点守候，严把船检关。

■ 百姓故事

## 我的驻站记者岁月

■周建巨

我从事新闻工作20年，其中7年是在《湖州日报》安吉记者站当记者。尤其是2011年5月，在我56岁时，因工作需要，毅然第二次主动去安吉记者站工作。那段艰苦的日子，我至今记忆犹新，仿佛就在昨天。

驻站记者特点是“看得见你的人管不着，管你的人看不见”。驻站工作不需考勤打卡，全凭自觉工作。2013年春天，妻子突然打来电话：“我摔了一跤骨折了，上了石膏，躺在床上不能动，你马上回家来。”我思索片刻后说：“我这里很忙，你骨折不是一两天能好的，请你双林老妈过来照顾

吧。”她生气地说：“亏你想得出，我妈80多岁，让她来照顾我，说得出口吗？”后来，她的小姐妹闻讯，纷纷来我家照顾妻子，总算度过了这段艰难日子。

2014年6月初，儿子参加高考，我打电话对他说：“老爸没空陪你，考好后自己打车回家吧。”第一天妻子开车送他到湖州二中考场后，就回家做饭了。可到了12点多，还不见儿子回家，非常着急。原来，上午考试结束时，许多家长把车停在考场外面接孩子，而我只有我一人坚持下了车。车在齐腰深的水中走了约一公里，突然发现后面一辆湖州

军分区抗洪抢险专用车正从水中开过来。我急忙掏出记者证说：“我是《湖州日报》记者，去安吉作抗洪救灾采访。”于是，他们立即把我拉上车。随后，我写出了安吉抗洪救灾的报道。

2014年11月底，单位组织体检时，心电图显示，我严重心律失常，频发早搏。医生建议马上住院治疗，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。但我当时考虑到，此时正值安吉县“两会”即将召开，报社下达的报纸征订工作也已开始，如果这时住院势必严重影响工作，所以希望过了元旦再住院。医生无奈，只能在我病历上写上：病人坚

持不愿住院治疗，一切后果病人自负。我毅然在病历上签下自己的姓名……

勤奋工作换来丰硕成果，我的驻站记者成绩在县区记者中名列前茅。其间，我还兼任农村指导员，每周五挤出时间去村里办公，回到家里往往已天黑，坐在沙发上累得一动也不想动了。我的付出也得到领导的认可，先后获得浙江省优秀农村工作指导员、湖州日报报业集团特别贡献奖、湖州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。

回望自己走过的路，虽然历经艰苦，但也很有意义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：人生是用来奋斗的！